

目前教育技术研究问题的 哲学深思: 纠结与矛盾

□ 兰国帅 李 艺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教育技术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支持体系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分别决定了教育技术实践者与教育技术理论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从而决定了教育技术实践者与教育技术理论者的“教育技术观”。因此,我们有必要建构一种教育技术研究的“实践哲学”,换一种研究视角来重新深思教育技术研究活动的本真面貌。在“实践哲学”思维框架关照下,构建一种全新的“教育技术研究哲学”,使得“教育技术研究”成为一种不断创生和成长的“特别的反思”,这是“实践哲学”赋予教育技术研究的新的哲学使命,即在深思过程中,在技术思维关照下,有能力对以往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实践规则”进行不断地重构,进而能够直面各种全新的“教育现象”,面对各种未曾预见的“教育问题”。

一、教育技术研究哲学应聚焦的问题

1.从“认识论”角度,聚焦教育技术研究的“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一方面,关切教育技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现状”“学术需求”“学术生活”和“生存状态”等,及他们如何获取“教育技术知识”、如何利用教育技术知识、如何看待教育技术知识与“知识何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走进“教育技术实践”,探究“教育技术知识”和“教育技术实践”之间得以联结的可行路径,以此为基础性前提,勾勒出“教育技术研究认识论”的思维愿景。基于此,我们认为,“教育技术研究认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将教育技术知识(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技术行动(教育技术实践)相联通,打通“教育技术知识(教育技术理论)”在产业界与学科界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让“教育技术知识(教育技术理论)”在更多领域发挥应有的实践效用,避免认识仅仅流于表面,探讨面向“教育实践的认识论法则”,从而走进“教育技术研究认识论”的深层次问题。

2.从“本体论”角度,瞄准教育技术研究的“本质问题”。对准教育技术研究的依附性(学科交叉性)、技术性和实践性等教育技术的“特殊性”,探讨教育技术的学科走向,以及得以生存的学科背景问题。深思教育技术研究的实践性、技术性、依附性(跨学科性、学科交叉性),以及教育技术研究的性质、概念、分类、逻辑起点和立场等问题,进而潜入教育技术研究内部,对其“特殊性”因素进行系统探究与反思。重视教育技术的顶层设计,确立教育技术学科体系框架及其学科知识范畴,回答教育技术学学科的逻辑起点、教育技术学科的价值和作用、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践哲学、技术哲学、教育哲学、教育技术学元研究等研究方法论问题等有关“教育技术研究本身”的问题;回答有关“教育技术研究”能够产生“现代信息化教学理论、教学媒体理论、教学设计理论”等何种“独特理论”的问题;回答怎么用“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的方法、现代媒体应用于教学的方法、信息化教学设计的方法”等教育技术学独有的理论方法去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以加强学科核心理论体系建设。探究教育技术的“在”,理解教育技术作为一项特殊活动的深刻内涵,从而为“教育技术实践”提供一种精准的“行动理念”。

3.从“价值论”角度,检视教育技术研究的“价值取向”。重构“教育技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探究“教育技术研究”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化解教育技术研究中的“价值矛盾”,实现教育技术实践的“价值诉求”。总体思路为,以“价值哲学”的思维框架为反思参照,澄明各种教育技术研究的“价值矛盾”和“价值争论”,进而寻求从“形而上学”转向“生活实践世界”回归的教育技术研究的“价值路径”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认为,从学科的立场看,教育技术研究价值论的新的使命便是,对当前教育技术研究中存有的诸如教育技术研究维系研究者的价值偏好(价值性)和价值中

立(科学性)之间的关系、中外教育技术学的“引进”和“创生”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学学科和其他学科知识架构之间的关系等较为突出的“价值谬论”,做出合理的、正确的“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探寻以何种“价值立场”,进行有足够话语权的教育技术研究,创建具有原创性意义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研究,是这一新时期教育技术研究的“价值取向”。

4.从“方法论”角度,重构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论”,构建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论体系”。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哲学”必须聚焦的基本问题是探寻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技术实践之间的“适切性”和“切实性问题”。由于中国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薄弱,甚至整体性缺失,致使“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相分离、教育技术的研究范式长期存在“对立现象”。此外,在进行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重构过程中,无论在空间层面还是在时间层面,教育技术研究对教育技术实践的影响力较弱,其节奏显得极其缓慢。对微观的教育现实问题和宏观的教育现象问题的改造力度也显得极其有限,尤其是教育技术研究方法体系的思维导向和顶层设计的缺失,导致教育技术研究的“技术化与工具化倾向极其明显,研究价值被明显“异化”。教育技术研究的方法技术问题逐渐成为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的“绝对价值”。面对不断变革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应力求坚持“教育技术研究”既要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路线”,又要坚持顶层设计“从上到下、从抽象到具体的总体构想”,从而积极推进教育技术的研究方法论体系架构。

二、教育技术研究所面对的“新的哲学使命”

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技术研究”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工程,而且是一项哲学性工程。学科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与长足发展,唯有经历学科研究层面的哲学深思(哲学反思)才能打破原有的学科理论体系的结构框架,产生“质变”。因此,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基于“实践哲学”的“教育技术研究哲学”,构建一种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基础而存在的,且能够对“教育技术研究自身”进行持续反思的“实践哲学”。

然而,基于教育技术研究的这项哲学性工程又是十分艰巨的,它需要教育技术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不断地对教育技术学科领域的不同概念及相应的概念体系进行区分和“澄明”。那种企图把“教育技术研究”引向程序化、简单化的所谓的“科学方式”和“教育技术研究”,尽管可以用

来探讨很多教育问题,但绝不可能真正走进“教育技术实践”、直面教育实践中的“人”和解决真实的教育问题,这就是教育技术研究“特殊性”的实践性之维的集中体现。

从宏观角度出发,“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要坚持“吸收借鉴、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发展原则,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有关的“教育技术理论(教育技术知识)”和“教育技术实践经验”,警惕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的“盲从心里”和“依附心态”,要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实践”和“中国的本土教育文化”,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敢于形成“中国模式”的中国教育技术学派。同时,必须有严谨的学术作风、宁静致远的心境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来从事教育技术的学术研究。

从微观角度而言,当代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分“两条路径”展开,一条是置身真实的教育情境、叙述真实的教育实践生活;另一条是沿着形而上学的路径登上教育技术研究的理想巅峰。沿此“两条路径”出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教育技术专家”,一类为“教育技术家”,另一类为“教育技术学家”。但是,在真实的教育生活世界中,他们却常常把我们引向了事物的“两个极端”。在实践的一个极端,“教育技术家”们聚焦于教育技术“烹调术”的模式化探究,希望能够为一线教师(教育技术实践者)提供一整套、一系列的供其照搬操作和程序化的“规范化的实践操作指南”,然而却导致了那些面向真实教育实践的教育技术实践探究活动显得极其烦琐、冗长而充满“教条主义”;在理论的一个极端,出于对“教育技术理论”的盲目信奉和崇拜,“教育技术学家”们所提供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往往又显得“曲高和寡”,导致“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时常处于“游离”和“远离”真实的教育存在和真实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的“阳春白雪”状态,从而致使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自身又陷入了无限的“挣扎”和“矛盾”之中。

对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恰好需要培养有“高雅理论气质”的“教育技术家”的这样一批“大家”。因为,基于实践哲学的“教育技术研究哲学”的基本立场要求,“教育技术研究”应始终定位于服务教育技术实践和解决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显示形下的形上思考之中。“教育技术研究哲学”构建的起点和归宿都应该指向教育技术实践抑或指向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因此,新时代下教育技术研究哲学的“重大使命”便是,期待我们能够在克服以往“教育技术研究”中否定一端、成就另外一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之中,倡导一种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相互依存、多元共存、即此即彼、求同存异的教育技术研究的“和谐方法论”。

■ 《现代远距离教育》2018年第1期,约12000字